

語言使用與職業階層化的關係： 比較台灣男性的族群差異

蔡淑鈴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本文嘗試將語言使用與語言技巧帶進地位取得研究裡來，凸顯出語言在社會階層化的過程裡扮演著雙重的角色：1.國語能力是一種語言資本，有利於職業地位的取得；2.在本質上，語言使用是權力關係的展現，因此語言資本的獲得與分配，本身就是一個不平等的社會階層面向。文中使用 1992 年和 1999 年的社會調查資料來檢視語言的雙重角色，並比較閩南、客家、外省三個族群的男性經驗之異同及其變遷趨勢。分析結果發現：父子代間職業傳承、教育階層化、勞動市場區隔、以及語言流利程度等因素對於男性職業地位取得的直接影響力相當穩定，比較特殊的是族群差異的變化。此外，國語在台灣已經有非常穩固的市場價值了。就個人的語言供給來說，國語愈流利的人職業地位就愈高。就工作的語言需求而言，使用不同語言的工作在職業地位上有清楚的階序：閩南語的工作領域是一個「壞」的勞動市場，使用國語的工作領域則是一個「好」的勞動市場。

關鍵詞：語言使用、語言資本、職業成就、地位取得、族群

Using data derived from two social surveys carried out in Taiwan in the 1990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ways in which language skill and usage are linked to ethnic disparities in occupational achievement. Combining insight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language, I argue that linguistic capital is a composite of human, cultural, and social capital, useful for getting ahead. Regression analyses are used to examine the role played by language in the process of occupational achievement among men aged 21-64. Results of empirical analysis indicate that Mandarin skills, which are unequally distributed among ethnic groups, represent linguistic capital in the labor market. Meanwhile,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origi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egregation between state and private sectors, and Mandarin proficiency on ISEI scores are stable during the 1990s. Patterns of ethnic effects, however, have changed over time.

Key words: language usage, linguistic capital, occupational achievement, status attainment, ethnicity

一、前言

既有的社會階層研究指出：在多族群的移民社會裡，優勢團體的平均教育水準通常高於弱勢團體，因此其平均職業地位也比較高，譬如美國白人族群的社經地位高於非白人族群(Hauser and Featherman 1977；Rumbaut and Cornelius 1995；Tienda 1982)，以色列是猶太族群的社經地位高於阿拉伯族群(Shavit 1990；Lewin-Epstein and Semyonov 1994)，台灣則是外省人的社經地位高於其他族群（蔡淑鈴 1988；林忠正、林鶴玲 1993；吳乃德 1997）。相關文獻除了以基因遺傳、偏見、制度性的歧視、族群市場區隔、及殖民剝削等原因來解釋族群（或種族）的階層化現象以外，也有許多研究認為出身家庭之社經地位（與資源）是否平等才是一個最具關鍵性的因素（詳見 Bonacich 1972；Duncan 1969；Hannan 1979；Hechter 1974；Wilson and Martin 1982；Keith and Herring 1991；Evans and Kelley 1991；Grusky 1994 之討論）。在這方面，地位取得研究提供了一個適用的分析架構，可以用來檢視多種社會機制之交互作用，釐清出身家庭背景與教育取得對個人社經成就的影響，因而在七○與八○年代時，成為社會階層研究的重要典範之一。到了九○年代後，社會學出現了許多有趣的理論，彰顯出在日常生活裡也有許多顯著的社會不平等現象，語言的使用即其中之一例。在新興研究的啟發下，本文嘗試將語言使用與語言技巧帶進地位取得研究裡來，凸顯出語言在社會階層化的過程裡扮演著雙重的角色：1.國語能力是一種語言資本，有利於職業地位的取得；2.在本質上，語言使用是權力關係的展現，因此語言資本的獲得與分配，本身就是一個不平等的社會階層面向。

本文認為在多語系的移民社會裡，語言使用不只是和語言能力有關，反映出個人的習性、階層位置、以及族群類屬而已，還有時空脈絡的意涵，涉及到宏觀社會的選擇與規範，受到歷史發展、人口組成、以及政治權力分配等結構因素的制約。以台灣的居民來說，近百年來

曾經兩度轉換國語。兩次語言的轉變，最初都是因為外來武力的介入，由戰爭的結果來決定政權的轉移，新的統治階級因而得以掌控住政經資源的分配，並經由學校系統以及文化傳播媒體來強制實行單元文化的國語政策，建立新的語言階序。由於語言的使用具有容己、排他的功能，因此我猜想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不論是有意的設計，還是無心的結果，單一國語政策都有可能已經先在學校裡，然後在勞動市場上，維持著（甚至強化了）不同語言族群彼此之間的權力關係與地位階序。特別是，近年來的一些相關研究一再發現：因家庭社經資源不平等而有教育機會不均的現象，這是世界性的趨勢，台灣則除了一般的教育階層化以外，還有省籍差異的情形(Tsai 1992；Tsai and Chiu 1993；Tsai et al. 1994；Tsai 1998)。然而，由於我們以往的研究並未直接檢視過語言、族群、及社會階層化的關係，因此目前尚無法確認不同族群在社經成就上的差異是否（又，有多大程度）可歸因於語言使用的因素。

本文主張就微觀層次而言，語言的獲得和教育的取得在過程上有相當程度的重疊，兩者都是一段由出身家庭到教育系統的（早期）生命歷程，因而同樣都會受到賦予變項（譬如階級、族群等環境背景因素）的影響，同時也會對個人（後期）生命歷程的發展——譬如職業地位的取得——有所影響。有鑑於此，我認為從地位取得的研究途徑切入，可以讓我們在實證資料的配合下，有系統的使用多變項統計分析方法來檢視語言的雙重角色。就語言的「依變項」角色而言，我們可以比較賦予變項（譬如階級背景、族群身份、社區環境等因素）與成就變項（譬如學校教育與語言練習等因素）對語言能力之相對影響力，明辨出語言獲得之決定性因素為何。以語言的「自變項」角色來說，我們可以確認語言能力與語言使用對職業階層化的效應是否非常獨特，是否展現出傳統地位取得研究的解釋變項——階級背景與學校教育——所無法解釋之「淨」作用。上述之因果分析，應有助於釐清那一種語言技巧可以讓那一類的語言使用者在那一個勞動市場兌換到一些有利於向上社會流動的語言資本。本文使用九〇年代初期與末期的兩筆

社會調查資料，來比較閩南、客家、外省三個族群的男性經驗之異同及其變遷趨勢。在進行實徵分析的工作之前，首先回顧一些相關的理論與文獻，整理出語言與社會不平等的關係，以此作為整個研究之立論根據。

二、理論回顧：語言與社會不平等的關係

社會學在解釋語言與社會階層化的關係時，焦點大多放在「有目的性的使用語言以達到某種社會目標」上。大致說來，社會學的解釋可以歸納成兩大類。第一類的解釋強調語言的「社會性價值」，主張語言不只是人際溝通的工具而已，尚具有社會化的功能，這種說法以同化理論為主軸（譬如 Gordon 1964；Mead 1974；Sapir 1974；Berrol 1995）。第二類的解釋強調語言的「象徵性價值」，將語言視之為權力的中介，主張個人與社會團體可以透過語言的使用，展現其能力並追求其利益，這種「語言即權力」的觀點以 Bourdieu (1991) 晚近的「語言資本論」著稱。本文綜合上述兩種論點，強調在微觀層次上，語言能力是一種有價值的資本，有利於職業地位的取得；另一方面，語言也是一種權力，一種文化意識型態，與政治有著極密切的依存關係，因此在宏觀層次上，語言的使用和大社會的語言規範有極密切的關係，並非各種不同的語言技巧都可以轉換成有效用或同等值的語言資本。

首先，對於社會階層的研究者而言，語言之所以有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在本質上，語言行為的運作是一套由差異、評價、排比、到同類相聚、異類相拒的社會系統。更明確的說，語言是「心之鏡」（Chomsky 1975），映照人類的心智活動，代表著一種特殊的認知能力。因此，不只是兒童的語言能力會被評鑑，被視之為兒童智力發展的具體指標，一般人的語言行為也常被評價，被拿來當作是篩選人才的要件。能言善道者有如隨身攜帶著一個聰明伶俐的印記，一開口說話就像是將印記顯露於外似的，容易引人注意，有利於爭取人才拔擢的機

會，譬如在口試時比較容易脫穎而出。簡言之，我認為「聽得到」的語言能力和「看得到」的相貌一樣，同樣都是「散發式」的外顯地位特徵(Webster and Driskell 1983)，因此如果社會學家相信外表吸引力有助於爭取社經成就機會的話（詳見 Mulford et al. 1998 之討論），那麼語言技巧也應該會展現出相類似的效用，有利於向上社會流動才是。

由於社會階層研究的重點是要探討結構性之社會不平等，因此特別關心透過語言行為模式所流露出來之「集體性」的不對等權力／地位關係。譬如說，同一社會不同類屬的人，如果在語言使用的技巧上流露出顯著差異的話，這些團體性的語言行為差異是否與該社會的階層分化脈絡相互映照呢？又，不同的語言是否會因為使用者之社會階序不平等而在該社會裡得到差別性的價值評比，受到不一樣的政治對待呢？回顧相關的社會學文獻，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非常鮮明的階層化觀點，那就是：語言差異映照階級地位的不平等，Bourdieu(1991)如是說。

Bourdieu(1991)建構出一套文化再製(cultural reproduction)的理論典範，用來解釋語言、不平等、及權力三者之間相互交結的複雜關係。Bourdieu 的基本論點是：當說話者與聆聽者在進行語言交換的那一瞬間，也同時在實現(actualize)他們分別所屬之團體的「象徵性」權力關係。Bourdieu 認為任何發言都是一種實踐(practice)的形式，因此語言表達可說是在「語言習慣」與「語言市場」的關係下所決定出來的產品。「在特定的語言市場裡，使用最適當的語言」之能力，稱之為「實踐能力」。這種語言實踐能力的多寡，每個階級不同。一般而言，支配階級的實踐能力比別人強，因為支配階級所掌控的那一套語言特徵，構成該社會的宰制文化，得到社會最高的評價，可以替支配階級兌換到「語言資本」。依照 Bourdieu 的說法，語言資本係由那些可以讓資源掌控者藉著社會區別（秀異）而獨享利益的語言資源所組成。換言之，語言是一種資本，其資源分配因階級之不同而不均，而且這種階級不平等的現象又會一代傳一代，在歷史過程裡一再被複製。此外，Bourdieu 還主張所謂的「標準語言」都是被常態化過(normalized)

的產品。他認為雖然教育系統在建構、正統化、並強制執行官方語言的過程裡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在貶抑方言的價值、建立新的語言階序方面，學校制度與勞動市場之間的辯證關係才是最具決定性的關鍵因素(Bourdieu 1991: 48-9)。

雖然 Bourdieu 一再強調「語言是一種文化資本」，但是在他的討論裡，我們可以看到語言資本的概念除了涵蓋了文化資源的象徵意義外，尚涉及到其他多重機制，包括社會階級的權力關係、學校教育的馴化作用、以及勞動市場的利益獨佔等機制的運作，因而與「語言是社會資本」的概念交互糾結在一起。換言之，學會說一種語言，並且熟稔語言交換行為模式所代表的意義，不僅可以讓我們獲得文化資本，有能力和這個團體內的人交換符徵，而且還可以讓我們擁有社會資本，得以進入一個由特定儀式和符碼所組成的對話世界裡(Ben-Rafael 1994)。

必須強調的是，雖然語言的獲得和個人的智力發展有關，但是除了語言學習的因素外，語言的獲得與使用和外在環境因素——包括家庭、社區、學校、及國家政策——也有極密切的關係，會受到主觀性與規範性因素的影響，因此語言獲得並不同於自發性的語言學習(Krashen 1988；1995)。事實上，語言的獲得與使用是一種慣性行為，通常必須在特定的社會情境裡進行，而且需要經由長時間的反覆練習，才有可能學到語言的精髓，其結果是：語言油然而生出社會化的功能，讓使用者在不知不覺中被同化了。更具體的說，我們通常是在早期社會化的過程裡，經由潛移默化的作用，學習到語言交換的行為模式。有些習慣，甚至是在說話者自己都還不太明瞭話中的意思的時候，就已經養成了。雖然大多數人長大後，就會淡忘掉自己在幼兒時期為學習語言所付出過的努力與所經歷過的挫折，然而練習語言使用的技巧還是可以說是我們在生命歷程裡第一件必須學會的困難功課。有趣的是，一旦學會使用某一種語言之後，尤其是長時間依賴單一母語來進行社會交換的話，這種語言就會根植在我們的存在裡，變成我們人格的一部份，全面性的影響著我們的社會生活。

以 Fishman(1972:46)的話來說，就是：「母語是靈魂的一部份」。此無他，「社會本我」係經由「象徵互動」的過程形塑出來的(Mead 1974)。所謂象徵互動的過程，亦即個人的主觀經驗，透過符徵的相互接受，變成社會客體的過程。換言之，根據 Mead(1974)的社會心理學理論，個人若想要真正的融入某個團體的話，就得先內化這個團體之成員的深層思想與慣性行為，譬如學習使用該團體的共同語言。另一方面，Sapir(1974)強調語言是人類藉由自發性產生符號系統，以此來溝通想法、情感和慾望的理性方法，因此不論是在利益團體裡（例如家庭、大學生社團、或工會），或是在社會場合上（例如政黨聚會），語言都具有團結眾人、凝聚人心的強悍力量。這種語言使用最微妙之處是：當團體內的人使用語言來製造內部凝聚力的時候，他們所使用的語言就會同時激發出排斥外人的作用。所以，語言通常也是領域與界線的標記。

語言作為群體識別的標幟最鮮明的例子，莫過於不同（語言）族群之融合與分化的問題。在多族群的移民社會裡，不同的語言技巧和個人的族群背景有極密切的關係。一些獨特的語言行為特徵——譬如語言種類、方言、口音、腔調、文法、字彙等——通常也是族群身份的標記，代表著語言使用者由歷史傳承下來的文化資產，並映照出他們目前的社會環境與處境。此外，由於語言是每個歷史文化體最核心的價值載負者，「記載著過去、表達現在與未來的態度和抱負」(Giles 1977:3-4)，所以語言通常也是族群認同最珍貴的泉源，更是進行族群動員的利器。這是因為一如上所述——語言具有社會化的功能，容易產生出「包容自己人與排拒外人」的雙重作用，因此語言意識被激發起來後，可以動員並凝固族群的團聚力。這種「對比式之自我認同」(Fishman 1972:52)的語言功能，對於「民族主義」的建構尤其重要（詳見 Calhoun 1993 之回顧）。「語言社會學」因而特別關心族群分化、族群衝突、以及族群意識的建構，凸顯出語言與政治資源分配的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當社會裡的每一個族群都只會說一種（自己本族）語言的時候，語言才會是族群身份的「精確」標記。在義務教

育相當普及的工業化社會裡，共同語言（亦即國語）得以經由學校教育系統以及大眾傳播媒體普遍實行，語言作為族群身份的標記就不可能完全精確，這是因為語言和膚色或其他一些由祖先傳承得來的身體特徵之族群身份標記不一樣，語言是可以改變的。誠如 Giles(1977)所言，族群團體有時候——尤其是在受到威脅的時候——會利用語言特徵來強調文化差異，保持界線，防止外人躐越，但是有時候——同樣也是在受到威脅的時候——族群團體的成員也可以改變自己的語言行為，削減與眾不同的異類特徵，以便進入別人的領域。易言之，在微觀層次上，語言的使用與選擇不只受制於慣習，也有自我利益的一面。

在多族群的移民社會裡，語言同化常被認為是族群同化非常必要的一步。誠如 Tuan(1995: 107)所言：弱勢（語言）族群若可以快速和優勢族群同化的話，就可以取得較高的社經地位；反之，很難同化的族群常會沈淪到社會的底層去。依相關文獻的發展來看，類似這種「沈或浮」(Stein 1986)的說法是相當普遍的共識。更具體的說，社會學的理論大多採用「同化模式」的觀點，主張：如果弱勢團體可以很流利的使用優勢團體的語言的話，將有助於他們儘速和宰制文化的符徵融合在一起，讓他們有機會進入社會的主流階層（例如 Gordon 1964；Hirschman 1983；Berrol 1995）。的確，許多實徵研究發現，不論是在美國、加拿大、或在澳洲，流利的英文都可以幫助弱勢族群的下一代改善學業表現，增進他們的教育取得，繼而提昇他們的勞動市場成就（例如 Tienda 1982；Tienda and Neidert 1984；Neidert and Farley 1985；Evans 1987；Rumbaut and Cornelius 1995；Portes and MacLeod 1996；Mouw and Xie 1999）。

在語言轉變方面，Kulick (1992) 的文化人類學理論特別值得參考。Kulick 主張人類係透過語言的使用表達出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以及自己對變遷中的社會世界之概念。他從文化再製的角度來剖析 Papua New Guinea 村落的語言轉變過程，其田野研究結果顯示：當弱勢族群遭到宰制族群的貶抑時，這種被貶抑的族群認同會和本族語言的使用扣連在一起，由於兩者之緊密相連不利於個人社經成就的發展，因此

當出現社會流動機會的時候，弱勢族群就會放棄掉自己的語言，改為使用宰制族群的語言。Kulick 強調語言轉變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個人（與團體）改變了原有的價值與目標之故，他認為雖然宏觀社會結構的變遷力量不容忽視，但是追根究柢，弱勢族群渴望著「變貌」（transform），並且將語言視之為「通往變貌之路」，這種希冀藉著使用宰制族群的語言來爭取成就機會、提昇社經地位的想法，才是造成弱勢族群的語言逐漸失傳最深層的原因。

總言之，每個人都在特定的時空下，經由學習與自我反省，在語言使用上做出「厚此薄彼」的選擇，此選擇不只出自於個人的慣習或情境因素的刺激而已，其實還有自我利益的一面。「在適當的場合裡使用最適當的語言，這是一種實踐能力，代表著個人的語言資本，有利於社會地位的取得」，這個道理我們都可以理解。問題是：什麼是最適當的語言呢？答案或許繫之於語言規範。在多語系的移民社會裡，語言規範可說是一種外在於個人的社會選擇，是權力與歷史、文化、以及社會規範等宏觀機制交結運作的結果。特別是，國家機器得以經由政治過程來制定並實行國語政策，建立（或改變）語言使用的規範，並經由教育系統和大眾傳播媒體，推廣國語使用的正當性和價值。其結果是：國語比其他語言擁有更多的語言資源，其價值在該社會裡被普遍認可，代表著普同化的語言資本。

在社會階層化的過程裡，語言作為一種外顯的地位特徵所扮演之族群識別的標幟角色，其功能就如同語言在複製階級不平等一樣，都和世代社會流動（或傳承）一起鑲嵌在歷史發展的脈絡裡，因此接下來本文將從台灣的歷史發展來檢視語言、族群分化、及社會不平等的關聯，詳細解釋為什麼語言資本的獲得，本身就是一個分配不均的階層面向。

三、台灣的歷史脈絡

(一) 權力決定語言的正當性

在討論語言如何充當一面鏡子映照台灣目前的族群分化和社會不平等之前，我們必須了解語言和族群團體一樣，也有生存與延續的問題，會隨著武力征服、遷徙、人口轉型、或國家統合，在某個時間點出現（或消失）在某個社會空間裡。這些宏觀機制和歷史、權力、以及社會規範交結運作的結果，相當程度的決定了每一種語言的存活機會(Ben-Rafael 1994)。一般而言，每個社會的「正當語言」都與該社會的國家文化以及集體歷史的定義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由於語言是壟斷知識以及控制知識傳播必備的武器(Foucault 1972)，所以語言如果淪為主流文化與政治力量的統治工具的話，並不足為奇。事實上，Giles(1977)就是如此的主張。他強調支配階級（與族群團體）係透過語言的掌控，凸顯出自己的優越與秀異，以達到鞏固政權、維護既得利益的目的。職此之故，Grillo(1989)認為只要和語言宰制、語言階序、語言不平等有關者，就避免不了會引起政治衝突與權力鬥爭。

若從歷史變遷的角度來看，權力可以決定社會階層結構的本質與變遷（詳見 Lenski 1966 之討論），同時也可以決定宏觀社會的語言規範變或不變（黃宣範 1993），權力可說是形塑語言正當性、語言宰制、以及語言不平等的終極因素。以台灣來說，「族群性」常隨著社會與政治的發展，因歷史演變而被建構出來。在過去四百年來，「族群」這個名詞連分類方式都一直在變化著，更遑論其內容與意義了(Huang et al. 1994)，因此語言作為一種外顯的族群識別標記，其角色與功能當然也會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所變化。雖然在不同的時空裡，族群意識的內涵會有所差別，但是語言一直是族群分化的一個重要面向。目前，台灣的居民大致可分為四種（語言）族群：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及外省人。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全台社會調查資料只有極少數的原住民樣本，所以本文將實徵分析的重點放在比較其他三個漢人族群的集

體經驗上。

首先，在漢人移墾台灣的初期，由於生存競爭激烈，因此武質社會的色彩濃厚，不只漢人與原住民常起衝突，漢人之間也常有分類械鬥的現象。漢人移墾者的原籍地域觀念強烈，不論是同樣說閩南語的泉州人與漳州人，或是語言不通的閩南人與客家人，彼此之間都曾發生過尖銳的分類械鬥。根據施添福(1987：179)的說法：「乾隆末年以降，各籍移民在台的空間分佈已經趨穩定，呈現海口和沿海平原多泉，內陸平原多漳，近山平原以及台地、丘陵地則多客籍移民的基本分佈型態。」清代中葉以後，台灣漢人社會逐漸從祖籍分類意識中解放出來，而以現居的聚落組織為主要的生活單位，村廟與宗族組織擔任起整合社會秩序的任務，顯示出漢人移墾台灣後，落地生根，建立了自己的土著社會（陳其南 1984）。

日本人來了以後，台灣由農業的俗民社會逐漸轉向為工業的殖民社會。日本殖民政府一方面以嚴格的警察與行政組織來維持治安，另一方面則開始資本主義化的經營，並引進現代化的學校教育系統。日本殖民教育著重在「公學校」與成人識字班的普及，其目的是要透過日本語言（與數學）的教導，訓練出有知識、又有經濟生產能力，但是在政治上卻沒有主見的殖民地居民(Tsurumi 1977)。日本殖民政府於1937年開始推行同化政策，台灣居民首度享有和日本居民相近的公民權，不過學校教育系統的運作仍然維持著種族隔離的政策。1940年的普查資料顯示：到了日本統治時代末期，大約有27%的台灣人可以使用日文(Wang 1989：47)。日本殖民政府的「皇民化」運動是否達到預期的目標，迄今仍有爭議。沒有爭議的是，在殖民社會裡，種族一向是社會階層分化的主軸，當時的台灣社會因而清楚的劃分為兩個不平等的階級：統治的日本人與被統治的「本島人」。不論是閩南人或客家人，同樣都是被宰制的「台灣人」，都必須遵守日本殖民政府的法令，包括被迫學習日語、接受日本教育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中國國民黨政府（與軍隊）的接收台灣並撤退到台灣，中國大陸各省人口大量遷台。1956年的普查資料顯

示，大陸來台的「外省人」約為 90 多萬人，比原住民的 20 多萬人口多，但是和 800 多萬的台灣人（閩南人加上客家人）相比，只能算是少數團體（陳紹馨 1979：448）。那時候，外省人和台灣人在地理分佈上有明顯的隔離現象。根據 Gates(1981)與章英華(1986)的研究，早期外省人的居住地帶可以分為兩類：都市內環係日本人移出地帶，由大量移入的外省居民所據；都市外環則聚集在眷村。此外，當時台灣人與外省人彼此語言不通，很難溝通。然而，即使雙（多）語政策比較符合社會需求，但是在單元文化的國語政策下，台灣人還是不能「正當」的使用自己的母語，再度被迫學習並認同另一種陌生的外來語言。

總而言之，以歷史來說，台灣是漢人墾拓的邊疆海島。就地理而言，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相隔著 180 公里寬的台灣海峽。歷史的緊密性與地理的鄰近性使得海峽兩岸常被相連在一起，然而事實上，雖然台灣的歷史演變和中國大陸有著糾纏不清的關係，但是台灣的社會變遷有自己的特殊性。在中國歷史上（元朝與清朝），外來的征服者（蒙古人與滿州人）來到中原後，與漢人同化，放棄原有的語言，顯示出即使統治者不使用自己的語言，也不會危害到他們的特權地位(Sapir 1974: 65)。反之，在台灣歷史上，語言是外來政權必備的統治工具。在單一國語政策的高壓下，台灣人連續兩次被迫放棄本族語言，改用他人的語言。這種語言轉變的情形比較類似「殖民社會」的例子，和中國大陸的歷史經驗不同，和美國、加拿大、或澳洲等（英語系）移民社會的情況也不一樣，因此我認為台灣語言融合的現象比較獨特，和主流社會學理論所討論的「同化模式」有些差別。

（二）研究假設

詳而言之，歐美社會學引用「同化模式」的目的，通常是在討論少數族群（或種族）的同化問題，凸顯出使用正當語言的能力對「新」移民之社經成就取得的重要性。然而，第二次大戰後的台灣是「早期」移民必須再度轉換語言。不論是從宏觀層次之語言資源及語言正當性的競爭來看，或是就微觀層次之正當語言（國語）的獲得而言，本地

(多數)族群皆處於較不利的位置，在語言使用上經驗到較大的衝擊。在這種語言資本不可能均等分配的情況下，如果正當語言的使用有利於職業地位取得的話，那麼我認為這種顯著的語言同化效用應該出現在本地(多數)族群裡，而非在外省(少數)移民團體裡。此外，眾所周知，教育不只是一種最重要的人力資本，有時候也代表著個人的文化資本，所以在工業化的社會裡，教育程度(與品質)一向是決定職業地位分配的關鍵性因素(Shavit and Muller 1998)。基於此，當我們把語言當作是一個解釋職業階層化的自變項的時候，我們就必須把教育與家庭資源(階級以及其他相關變項)之顯著效應區隔開來，以測量到語言的「淨」效果，凸顯出語言作為一種外顯的地位特徵所獨有的作用。易言之，本文主張：

假設一：國語能力的獲得和出身背景及教育程度有關，但是控制住這些因素的影響後，本地族群和外省族群在國語流利程度上的差異還是很顯著。

假設二：教育是決定職業地位取得最重要的因素，不過當考慮了教育階層化及相關因素的影響後，國語能力的獲得對於職業地位的取得應該還會有一些顯著的正效用。

假設三：國語流利程度對職業地位高低之「淨」效用，對於本地族群的影響較大。

本文提出上述三個研究假設，主張本地族群的語言經驗有別於外省族群係基於多個理由。其中，最明顯的原因當然是因為國語政策的實行是一個政治過程。根據 Bourdieu(1991)的理論預測，官方語言是否可以壟斷語言市場，端視國家機器在開始運作時有無可以配合的條件。若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台灣來說，單一國語政策之得以強制實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國民黨政權當時是以「剛性威權體制」的姿

態出現，全面接收日本殖民政府的統治地位，並且獨佔日本人所留下來的資源，因此取得了掌控台灣政治力、經濟力、和社會力的有利條件（Gates 1981；蕭新煌 1997）。再加上國民黨政權接收台灣之初，由於種種政治、經濟行政上的失誤，使得台灣人與外省人之間潛存的社會文化差距與摩擦，因一件衝突事件而爆發為軍隊血腥鎮壓的二二八事件。這個「悲劇性的開始」（Lai et al. 1991），以及隨後的「白色恐怖」統治時代，產生了寒蟬效應，讓多數台灣人覺得「悲哀」，卻無力也無法抗拒國語政策的高壓。同時，台灣人與外省人之間，也存在著所謂的「省籍情結」。前總統李登輝曾寫實的回憶起「台灣人的悲哀」，他說：

我七十來歲，從日據時代、光復到現代，在不同的政權下，我深刻體會到做一個台灣人的悲哀。日據時代講台語，要在太陽下罰跪。光復後也一樣，我的兒子憲文、媳婦月雲在學校說台灣話，也曾被處罰脖子掛牌子。¹

更具體的說，國民黨政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台灣承繼了日本人所留下來的殖民地結構，因而得以透過高壓的政治手段來壟斷文化符徵，並掌控符徵重現的生機與權力。國家機器一方面以制度化、標準化、正統化、及圖騰化的方式，建立起北京話的正當性及其象徵意義，另一方面則打壓台灣本土（文化）意識的發展，刻意貶低本土語言的價值，並利用大眾傳播媒體醜化其形象，羞辱其使用者（黃宣範 1993）。根據王甫昌的說法，單一國語政策：

對於外省人來說，是相當合理、而且有意義的政治主張；但是它對於戰後第一代的本省人，卻有壓迫效果。在推行國語政策的實施下，不但日語被禁用，本省人日常使用的語言

1 自由時報 1994 年 4 月 14 日。

（包括閩南語和客家話）也被界定為「方言」。這些「方言」的使用，在國家所能控制的機構或場域中，受到嚴厲的壓制；但是同樣具有方言性質的外省人的各省家鄉話，則並未受到同樣的待遇。（1998：16）

早期台灣政治反對運動宣稱要對抗的「體制不公義」，指的就是這種專制排他的語言政策對於本省人在政治權力與社會文化上的雙重打壓（王甫昌 1994）。在解嚴之前，台灣本土語言只能在非官方或非公開的場合私底下流傳。即使到了九〇年代的末期，台灣政治體質趨向於民主化轉型，本土力量（意識）愈來愈強大，甚至在許多公開的場合上使用台灣本土語言才是「政治正確」，然而在一些公領域裡，本土語言的使用仍是政治上的禁忌。眾所周知，台灣的國家機器之所以獨尊北京話為國語的目的，是要傳達國民黨政權的一個重要訊息，那就是：中國國民黨所統治的中華民國代表著中國，台灣只是中華民國統治範疇內的一省，未來將會和中國大陸統一。根據汪宏倫的說法，長期以來，台灣的「國家」比世界其他國家更需要「想像」（Wang 2000）。為了要維持中華民國是中國的「想像」，國民黨政權在 55 年的執政期間，動員了所有可以掌控的政治、社會、文化資源，來宣導中華文化和中國意識，並教化台灣民眾。語言的宰制與控制只是其中的一環。

除了大眾傳播媒體外，教育系統是國家機器形塑國家認同、灌輸中國（文化）意識的重要機制，也是推行與實行國語政策最主要的場域。根據 Cheng(1994：379)的研究，在世界上所有母語不是北京話的地區裡，只有台灣是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全面使用北京話來教學。可以想像的到，對於大多數以母語為生活裡唯一（或最主要）的語言之台灣家庭而言，其子女在語文學習方面是如何的不利。語言能力不佳，不只會影響學業表現，無法通過台灣嚴格的升學考試。更甚者，在學校裡說台灣話是會被羞辱、被處罰的。語言上的挫折因而還會影響到教育抱負的形成，不利於人力資源的開發。特別是，本省口音的「台灣國語」常被等同於「沒有氣質、粗鄙的人」的語言，北京話則被視

之為「應該仰慕」的標準國語。透過語言的印記，本地（方言）族群被貶抑成受宰制的階層，自尊心受到了傷害。

另一方面，由於歷史使然，本省族群的家庭在戰後大多經驗到嚴重的世代「文化斷層」現象。父母與子女接受不一樣的國語教育，不只兩代之間無法直接承繼文化資本，不利於中產階級的品味培養，而且還會因為長期倚賴「外來語」來進行思考或其他更複雜的心智活動，使得母語退化成生活上的簡單用語，失去了作為一種語言原來在文化傳承與文化再製上應有的功能(Hsiao 1997)。反之，外省族群的家庭即使不是來自北京，其子女也有很高的意願，願意學習與使用國語。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外省人大多跟隨國民黨政府與軍隊來台，他們對於早期國民黨政權的情感、忠誠、及支持一直很穩定，「第二代」也受到這樣的政治社會化的影響（張茂桂 1993：246），因此在成長過程裡早已認同以國語（國旗）作為圖騰所象徵的「國家」意義。此外，外省人在地理分佈上，有過度集中在台北市與高雄市以及眷村的現象(章英華 1986)，再加上國語政策的實施，使得外省第二代欠缺學習與使用本地語言的動機。其結果是：對於外省第二代來說，不論大陸原籍何處，北京話有如（新）母語，國語就是他們族群認同的標記（Hsiao 1997）。

自 1980 年代以來，特別是 87 年解嚴以後，隨著政治角力的結果，台灣已出現過多種母語（族群文化）認同運動（詳見 Hsiao 1997；Hsiao 1998 之討論）。晚近也有許多研究（例如：黃宣範 1993；張茂桂 1993；王甫昌 1998；吳乃德 1999；蕭阿勤 1999），強調語言在族群建構、民族認同、政黨支持、族群政治等方面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彰顯出語言的政治關聯性。同時，台灣政治體質已經由威權統治轉型為民主體制，並於 2000 年經由總統選舉的結果和平轉移政權。在此轉變中，蕭新煌認為：

原本存在於台灣人和外省人之間的省籍情結和衝突已因
長期以來經濟成長和機會結構的擴大，社會多元和流動等因

素，加上 1980 年代以來政治民主化衝擊而大大消弭。…閩南族群快速恢復了身為多數族群的自信，同屬少數族群的外省、客家、和原住民、卻各有較特殊的族群心事。原住民有深厚的劣勢者焦慮感，在經濟處境、社會地位和文化傳承問題上均呈現明顯的集體不平感受。客家族群則對文化和語言的斷層特別敏感，也對長期被壓抑成為一支隱性族群有著不滿情緒。外省族群卻對外來政權的加速本土化和政治權力的重組有著莫名的不安和危機感。(1999：230-231)

最後，國語政策執行了半個世紀以後，現在台灣居民不只已經學會使用北京話，而且普遍使用的程度也到了令人非常擔憂母語會消失的階段（黃宣範 1993；徐正光、蕭新煌 1995）。然而，歷史本是一脈相承，在九〇年代裡我們應該還可以捕捉到一些顯著的省籍（族群）差異。本研究使用 1992 年與 1999 年的問卷調查資料來驗證語言和社會不平等的關係，文中所分析的樣本大多在國民黨威權體制下度過其生命歷程，因此他們的語言獲得和地位取得彼此之間應該還存在著一些特定的關聯，有待實證探討。由於假設驗證的工作必須配合資料的性質，所以本文接著討論資料的來源。

四、資料來源、樣本特性、及變項測量

本研究擬將語言使用的因素帶進職業地位取得的探討裡來，因此需要使用兩者皆備的全台隨機抽樣調查資料來進行實徵分析。一般說來，台灣的社會調查大概都會詢問受訪者的職業資料，但是較少注意到語言使用的議題，因此相關資料並不多，只有少數一些大規模的抽樣調查曾詢問過受訪者幾個與語言有關的題目。這些問卷調查都是使用主觀測量的方法，要求受訪者在一個由「完全不懂」到「非常流利」的尺度量表上，自行評估自己的各項語言能力，其中以 1992 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問卷（二）的問法和 1999 年「台灣族群關係的社

會基礎調查」的問卷設計比較接近。在這兩次調查裡，語言能力測量都是以 10 分為量表，比其他社會調查所使用的四或五等級的測量方法更詳細，可以捕捉到更多的變異性，因而較適合本研究之需求。本文就在這兩次問卷調查的資料配合下，進行統計分析的工作，並比較九○年代前後期的變遷趨勢。

1992 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係以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先抽選地區，再抽選出 41 個村里，然後到特定的村里去抽選 21 歲至 64 歲的受訪者，進行面對面的問卷調查工作，問卷(二)的部分一共訪問了 1,408 個樣本（詳見瞿海源 1992 之討論）。同樣的，1999 年「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也是以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先選地區，再選村里，然後再選取合格的受訪者，進行面對面的問卷調查工作（詳見王甫昌 2000 之討論）。不同的是，1999 年的調查一共訪問了 3,496 個樣本，年齡在 20 歲到 70 歲之間，分佈在 356 個村里裡。由於跨年（調查）比較的需要，本研究盡可能採取標準化的原則來選擇分析樣本，並處理變項測量的問題。

本文所分析的樣本一共包含了 1,710 個年齡在 21 歲至 64 歲之間父親是閩南、客家、或外省人、目前有工作、而且明確提供其他相關資料的男性受訪者，其中 580 個樣本來自 1992 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問卷（二），另外的 1,130 個樣本來自 1999 年「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必須說明的是，語言的性別議題雖然也很有趣，但是女性的職業地位取得過程和男性不太一樣，會牽涉到許多性別階層化的社會機制——譬如婚姻、家庭、或性別歧視等機制——的運作，因而必須特別注意一些與女性勞動市場參與有關的選擇性誤差問題，在處理上比較複雜（詳見蔡淑鈴 1990 之討論）。為了避免因處理這些選擇性誤差的問題而模糊掉原來的研究焦點，本文將分析對象限制為男性受訪者。有關女性或性別比較的議題，留待日後再來繼續探討。

在變項測量方面，本研究一共考慮了八種不同性質的變項。由於兩次調查的抽樣方法及問卷設計並非完全一致，因此本文在報告變項測量的同時，也順便檢視表一所陳列的各項描述性統計數據，比較

1992 年的樣本和 1999 年的樣本在一些主要特性上是否有明顯的差異。以下分別詳述這八類變項的測量方法以及兩次調查的基本統計資料。

表 1 分析樣本特性：比較兩次調查結果

樣本特性	1992 年	1999 年
一 次數分配 (百分比)		
1.總數	610	1130
2.依族群分		
閩南人	425 (69.7%)	871 (77.1%)
客家人	103 (16.9%)	116 (10.3%)
外省人	82 (13.4%)	143 (12.6%)
3.15 歲以前的社區經驗		
閩南人絕對優勢社區	328 (53.8%)	525 (46.5%)
客家人集中社區	89 (14.6%)	80 (7.1%)
外省人比例較高社區	65 (10.7%)	147 (13.0%)
其他類型的社區	128 (20.9%)	378 (33.4%)
4.依勞動市場分		
公家機構	97 (15.9%)	144 (12.7%)
私人機構	513 (84.1%)	986 (87.3%)
5.主要工作語言 ^a		
國語	140 (23.0%)	609 (53.9%)
閩南語	330 (54.1%)	867 (76.7%)
客家話	21 (3.4%)	43 (3.8%)
其他	119 (19.5%)	—
6.依 EGP 分		
白領階級	229 (37.5%)	526 (46.5%)
小資產階級	70 (11.5%)	124 (11.0%)
技術工人階級	116 (19.0%)	222 (19.6%)
非技術工人階級	91 (14.9%)	152 (13.5%)
農民階級	94 (15.4%)	86 (7.6%)
軍人	10 (1.6%)	20 (1.8%)
二 連續變項平均數 (標準差)		
1.父親的教育年數	5.21 (4.56)	6.45 (4.27)
2.15 歲時父親的職業地位 (ISEI)	37.55 (16.16)	39.48 (15.70)
3.教育年數	10.08 (4.31)	11.69 (3.38)
4.語言能力分數		
國語	6.11 (2.93)	6.90 (2.32)
閩南語	7.95 (2.25)	8.27 (1.85)
客家話	1.87 (3.34)	1.37 (2.70)
5.職業地位 (ISEI)	45.01 (15.87)	47.36 (15.44)
6.年齡	40.80 (11.84)	39.49 (9.89)

^a 工作語言的測量方法兩次調查不同，詳見文內之說明。

1. 族群身份

本文以父親的族群身份為準，將分析樣本分為閩南、客家、外省三個族群團體。由表 1 中，我們可以看到在 92 年的分析樣本裡，閩南人的比例接近 70% 的全台比例，而客家人的比例 (17%) 則高於外省人 (13%)。在 99 年的分析樣本裡，外省人的比例也同樣非常接近 13%，但客家人的比例 (10%) 偏低，閩南人的比例 (77%) 則偏高。

2. 族群隔離社區

在成長環境因素方面，本研究以 15 歲以前住過最久的社區特性來測量受訪者在社會化過程裡和各種語言接近的程度。根據王甫昌 (2000：225-227) 的研究結果，台灣各鄉鎮區里若依照不同族群人口比例多寡來區分的話，可以分成 16 種不同族群接觸經驗的類型。本文使用王甫昌的分類標準，認定出三種不同的高度族群隔離社區，分別是閩南人絕對優勢區域、客家人集中地區、及外省人比例較高的地區，在迴歸分析中以虛擬變項來凸顯這三種族群隔離社區和其他類型的社區的差別。比較表 1 所報告的兩次調查結果，我們可以看到 92 年的分析樣本有一半以上 (54%) 的人都是在閩南人絕對優勢的區域裡長大。在 99 年的分析樣本中，雖然閩南人比例偏高，但是 15 歲以前長期住在閩南人社區的比例反而比較低，只有 46%。此外，在客家社區長大的比例 (7%) 也比 92 年的 15% 低，這一點和 99 年客家樣本比例偏低可能有關。其結果是：99 年的分析樣本，不論是在外省社區或是在其他類型的社區長大的比例，都比 92 年高。

3. 出身家庭的社經背景

本研究依照地位取得研究的慣例，使用父親的教育程度和 15 歲時父親的職業地位來測量受訪者的家庭社經背景。文中之迴歸分析以學校教育年數來計算教育程度的高低，以 Ganzeboom et al.(1992) 的國際職業社經地位量表，把職業類別轉換為從 10 分到 90 分的 ISEI 分數，由 ISEI 分數的高低來反映職業地位的層級差序。我們可以在表 1 上看到，不論是父親的教育年數或是父親的 ISEI 分數，99 年的分析樣本平均而言都比 92 年的分析樣本高，經統計檢定結果得知這兩次調查的差異相當顯著。

4. 教育取得

教育取得是社會地位取得重要的一環。本文使用教育年數以及教育年數的平方來測量教育程度的「非線性」效應，在計算教育年數的平方時，已減掉一個常數項(10)以簡化迴歸係數值的範圍。如表 1 所示，99 年分析樣本的平均教育年數是 11.7 年，在統計上顯著高於 92 年的平均教育年數 (10.1 年)。

5. 語言能力

在 1992 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問卷 (二) 中，語言能力的測量方法是請受訪者分別回答三個問題：「對於語言方面，如果 0 分代表完全不懂，10 分代表很流利，請問您的國語 / 台語 / 客語大約是幾分？」。同樣的，1999 年「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的問法是：「如果請您為您自己使用不同語言的能力由 0 分到 10 分打一個分數，10 分代表『非常標準流利』，5 分代表『還算可以』，0 分代表『完全聽不懂』，那麼請問您的國語 / 閩南語 / 客家話 / 原住民語 / 英語大約是幾分？」。本文的實徵分析只考慮前三項語言能力。由於閩南語族群在人口比例上佔絕對多數，因此就整體而言，不論是那一次調查，本文所分析的樣本都自認為他們的閩南語說的比國語好，而且大多數人都不會說客家話 (詳見表 1)。比較兩次調查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 99 年分析樣本的國語能力平均是 6.9 分，比 92 年的平均 6.1 分來的高。在閩南語能力方面，也是 99 年分析樣本的自評分數(8.3 分) 比 92 年高 (8.0 分)。至於客家話則反之，99 年分析樣本的客家話流利程度 (1.4 分) 平均低於 92 年的分析樣本 (1.9 分)。雖然這兩次調查的相對應平均數看起來差距並不大，但上述這些語言能力的時間差異在統計檢定上都相當顯著。

6. 勞動市場特性

本研究使用兩個意義不同的變項來測量勞動市場區隔的效應，分別是：1.在公家或私人機構工作，及 2.工作上的語言需求。前者的測量比較明確，由表 1 可看到 92 年的分析樣本大約有 16%的受訪者在政府部門服務，到了 99 年時比例減少至 13%。至於後者的測量則較

為主觀，而且兩次問卷的問法有所不同。詳而言之，1992 年的調查係以單一選項的問法，詢問受訪者在工作（上班、做生意）的時候，大部分都講什麼話？反之，1999 年的調查則列出五種語言（國語、閩南語、客家話、原住民語、英語），讓受訪者以複選的方式來回答工作中最常使用那一（幾）種語言。在統計上，單選與複選的差別會造成跨年比較的明顯差異。如表 1 所示，雖然兩次調查的結果都是以閩南語為主要工作語言的比例最高，國語其次，客家話的比例很低，但是 92 年調查的單選問法使得將近兩成的受訪者無所適從，而選擇「其他」——包括雙語、多語、其他語言、或不知道等項目。另一方面，99 年調查容許複選的結果，使得受訪者勾選閩南語或國語為主要工作語言的比例，分別提高至 54% 與 77%，但使用客家話的比例仍然很低，只有 3.8%。本文之迴歸分析以虛擬變項的處理方式，凸顯出以國語（或閩南語）為主的工作環境和其他工作環境的差別。

7. 目前職業

本文除了使用 ISEI 分數來量化職業地位的階序外，還按照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 的 EGP 分類標準，將受訪者的職業依階級特性分為五大類：1. 白領階級、2. 小資產階級、3. 技術工人階級、4. 非技術工人階級、及 5. 農民階級，並使用 Multinomial Logit 迴歸分析來比較階級差異。在表 1 上我們可以看到 92 年樣本的農民比例比 99 年多；反之，在 99 年的分析樣本中有較多的白領階級。除此之外，兩次調查的階級分配百分比大致相近。另外，必須一提的是，不論是 1992 年或 1999 年的調查都有不到 2% 的軍人樣本。在 ISEI 量表上，我們可以區分出軍官與士兵的地位階序，按照軍階的高低給予不同的 ISEI 分數，因此可以把軍人樣本和其他樣本放在一起分析。就兩次調查結果而言，99 年受訪者的平均 ISEI 分數（47.4 分）高於 92 年的平均分數（45 分），這項差異在統計上具有顯著性。另一方面，由於 EGP 階級分類表上沒有軍人的位置，因此軍人只能自成一類，可是樣本人數又過於稀少，所以無法使用 Multinomial Logit 迴歸分析來推估其參數值，這部分的分析因而沒有包括現役軍人。同樣的，由於外省樣本沒有農民

階級，所以本文在推估 Multinomial Logit 的參數值時，將農民階級與勞工階級合併成農工階級，以便和其他階級類別相比較。

8. 時間變遷

在時間變遷方面，本研究比較兩次調查的結果來看九〇年代前後期的變化，並使用年齡變項來檢視世代的差別。雖然本文將兩次調查的分析樣本年齡都控制在 21 歲至 64 歲之間，不過整體說來，99 年的受訪者（平均 39.5 歲）還是比 92 年的受訪者（平均 40.8 歲）年輕一些，而且這項年齡差異在統計上也很顯著。

綜合而言，不論是分析樣本的族群人口比例或是年齡分配，1992 年和 1999 年的調查都有些不同，這些不同和上述所提到的那些單變項的跨年差異應該也有密切的關聯。有鑑於此，當我們在比較兩次調查的結果時，必須先將樣本特性不同所造成的差異控制住，以釐清時間所帶來的變與不變，所以本文之實徵分析除了使用 OLS 以及 Multinomial Logit 等多變項迴歸分析方法外，還利用 LISREL 的模型設定方式來比較跨組迴歸方程式的參數值。使用 LISREL 的妙處是可以考慮到不同組的分析樣本在「共變異矩陣」(Variance-Covariance Matrix) 上的差異，並提供一些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的相關數據，讓我們可以藉著自由度的增減以及相對應之 χ^2 值的變化，來確認時間變遷以及族群差異。

五、實徵發現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比較兩次調查的族群差異

在進行多變項迴歸分析之前，我們先檢視一些主要變項的描述性統計數據，並比較不同族群的跨年差異。表 2 報告三個族群在語言能力、出身家庭社經背景、及個人社經成就等變項的平均數與標準差。首先，就語言能力而言，不論是 1992 年或 1999 年的調查，我們都可以觀察到下列幾個現象：1. 平均說來，國語流利程度以外省族群最高，客家族群其次，閩南族群最低。2. 閩南人和客家人在使用母語時，都

比國語來的流利。3.兩者不一樣之處是：閩南人是多數族群，閩南語的使用在台灣較普遍，其他族群或多或少也都會說一些閩南語；反之，客家人是少數族群，客家話侷限在客家團體內流通，其他族群對於客家話還是相當的陌生。4.外省族群的閩南語技巧比客家族群稍微好一些，但兩者的差別在 99 年時已不顯著了。

表2 語言能力與社經變項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依調查時間與族群分

變項名稱	1992 年			1999 年		
	閩南	客家	外省	閩南	客家	外省
語言能力						
國語流利程度	5.36 (2.93)	7.50 (2.24)	8.26 (1.88)	6.54 (2.31)	7.87 (2.00)	8.30 (1.80)
閩南語流利程度	8.67 (1.63)	6.15 (2.63)	6.48 (2.51)	8.63 (1.54)	7.06 (2.33)	7.07 (2.16)
客家話流利程度	0.50 (1.38)	8.25 (2.62)	0.98 (1.65)	0.54 (1.25)	7.78 (2.92)	1.22 (1.88)
出身家庭社經背景						
父親教育年數	4.24 (3.91)	5.08 (3.98)	10.40 (4.91)	5.76 (3.91)	6.59 (3.59)	10.54 (4.60)
父親職業地位	34.84 (13.92)	34.79 (14.89)	55.07 (17.58)	37.39 (14.22)	36.70 (13.46)	54.45 (17.77)
個人社經成就						
教育年數	9.39 (4.33)	10.45 (3.60)	13.15 (3.63)	11.29 (3.44)	12.02 (2.94)	13.91 (2.28)
職業地位	42.81 (14.90)	45.38 (16.22)	55.96 (15.97)	46.30 (15.06)	46.72 (15.79)	54.36 (15.74)

另一方面，表 2 也顯示出：不論是出身家庭的社經背景（父親的教育與職業地位）或是個人的社經成就（自己的教育與職業地位），外省族群平均而言都高於台灣的兩個本地族群；若比較後者的差別的話，則以客家人的社經成就較高。上述這項族群差異其實不是新發現，在蔡淑鈴(1988)的研究裡早就已經討論過了，所以本文比較關心的是九〇年代的新變化。對照兩次調查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外省人在社經成就上的優勢雖然依舊存在，卻有稍微減弱的趨勢。詳而言之，不論是那一個族群，99 年調查樣本的教育程度都比 92 年的受訪者來的高。一般說來，當一個群體的教育程度提高時，他們的職業地位也會跟著提高。然而，這個通則雖然可以適用於閩南族群與客家族群的經

驗，卻不能用來解釋外省族群的跨年差異。如表 2 所示，外省人的平均教育年數在 99 年時是 13.9 年，稍微高於 92 年的平均 13.2 年，但是他們的平均 ISEI 分數是 54.4 分，略低於 92 年樣本的平均 56.0 分，不過這些時間變化在統計上並不顯著。換言之，由描述性的統計分析結果來看，外省人整體的社經地位在九〇年代裡維持不變，但是閩南族群與客家族群的職業地位則有顯著向上提昇的趨勢，因此省籍的職業地位差異有縮小的現象。

表 3 分析樣本之階級與勞動市場特性：依調查時間與族群分

百分比分配	1992 年			1999 年		
	閩南	客家	外省	閩南	客家	外省
1. 依 EGP 分						
白領階級	33.18	33.98	64.63	44.55	47.41	58.04
小資產階級	12.24	11.65	7.32	12.40	6.03	6.29
技術工人階級	20.71	19.42	9.76	19.86	21.55	16.78
非技術工人階級	14.12	19.42	13.41	13.78	13.79	11.19
農民階級	19.06	12.62	0.00	8.61	9.48	0.00
軍人	0.71	2.91	4.88	0.80	1.72	7.69
2. 依勞動市場的部門分						
公家機構	11.29	20.39	34.15	10.79	19.83	18.88
私人機構	88.71	79.61	65.85	89.21	80.17	81.12
3. 依工作語言分 ^a						
國語	13.65	33.01	58.54	48.34	66.38	77.62
閩南語	68.24	20.39	23.17	83.01	58.62	53.15
客家話	0.23	19.42	0.00	0.68	29.31	2.10

^a 工作語言的測量方法兩次調查不同，詳見文內之說明。

此外，我們還可以在表 3 上看到一些相關的現象。比方說，閩南族群與客家族群的白領階級比例都增加了，分別由 92 年的 33% 與 34% 提高至 99 年的 45% 與 47%，而農民階級的比例則明顯的減少。反之，外省人的白領階級比例由 92 年的 65% 下降至 99 年的 58%，技術工人的比例則由 10% 增加到 17%。另一方面，過去的研究曾指出：外省族群比台灣本地族群更傾向於集中在政府部門，從事軍公教的職業（林忠正與林鶴玲 1993；吳乃德 1997）。以 92 年的分析樣本來說，外省人在公家機構服務的比例的確最高（34.2%），客家人次之（20.4%），閩南人最少（11.3%）。然而，就 99 年的調查結果而言，外省人在公

家機構服務的比例只有 18.9%，比客家族群 19.8% 還低；反之，閩南與客家族群的相對應比例雖然也同樣都減少了，但只是小幅度的下降而已。由上述這些百分比的變化來看，外省人傾向於集中在公部門的勞動市場的傳統似乎已有鬆動的趨勢。在這樣的轉變中，語言使用的因素對於職業地位取得的影響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呢？又，不同族群在家庭背景與教育程度方面的差別是否會影響到他們的國語技巧，進而決定了他們的職業地位取得呢？為了回答上述的問題，本研究接著使用多變項的統計分析方法來釐清語言與職業地位取得的關係。

（二）語言資本分配不均：閩南族群的劣勢

本文認為語言能力是可貴的人力資源，不只代表著個人的文化資本，也是社會資本的表徵，具有多重的功能。在多語系的族群社會裡，不同的語言技巧和個人的族群背景以及在成長過程裡所能接觸到的語言資源有極密切的關係，受到家庭、學校、以及社區等因素的影響。本研究使用多變項的迴歸分析方法，來比較環境因素（以 15 歲以前居住過最久的社區類型以及出身家庭的社經背景為指標）、教育因素、及練習因素（以工作是否經常使用國語為指標）對於國語技巧的相對重要性，並測量族群的差異。

表 4 陳列四條以國語流利程度為依變項的迴歸方程式，分別就兩次調查樣本進行分析，以檢視九〇年代前後期的時間變遷。第一與第三條方程式是長迴歸，包含了族群、高度族群隔離的社區環境、父親的教育與職業地位、自己的教育年數、以國語為主要的工作語言、以及年齡等多個自變項。第二與第四條方程式是短迴歸，已將不重要的參數設定去除，只包含那些在統計上具有顯著影響力的解釋變項。比較這兩條迴歸分析的結果，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閩南族群的國語使用技不如人的現象非常顯著。

表 4 國語流利程度之決定因素：依調查時間分

自變項	1992 年		1999 年	
	(1)	(2)	(3)	(4)
族群 (相對於外省人)				
閩南人	-.665 (.313) [-.104]*	-.587 (.246) [-.092]*	-.263 (.184) [-.048]	-.304 (.152) [-.055]*
客家人	-.082 (.433) [-.010]	-	.134 (.256) [.017]	-
社區環境因素 (相對於其他社區)				
閩南社區	.147 (.223) [.025]	-	-.263 (.125) [-.056]*	-.274 (.125) [-.059]*
客家社區	1.532 (.391) [.184]*	1.417 (.306) [.171]*	1.019 (.254) [.113]*	1.058 (.240) [.117]*
外省社區	.966 (.332) [.102]*	.899 (.302) [.095]*	.503 (.180) [.073]*	.496 (.179) [.072]*
家庭背景因素				
父親教育年數	-.006 (.026) [-.010]	-	.040 (.017) [.074]*	.043 (.017) [.079]*
父親職業地位	.017 (.007) [.090]*	.016 (.006) [.086]*	.011 (.005) [.071]*	.010 (.004) [.065]*
教育年數	.320 (.028) [.470]*	.316 (.026) [.464]*	.247 (.021) [.359]*	.254 (.020) [.370]*
以國語為工作語言	.878 (.231) [.126]*	.870 (.229) [.125]*	.792 (.124) [.170]*	.799 (.124) [.172]*
年齡	-.033 (.008) [-.131]*	-.033 (.008) [-.131]*	-.008 (.006) [-.034]	-
常數項	3.507 (.656)	3.577 (.580)	3.400 (.438)	3.061 (.274)
R ²	.542	.542	.396	.395

* 顯著水準 $\alpha = .05$ 時顯著。各變項之迴歸係數推估值依 b、(S.E)、[β]之順序排列。

更詳細的說，不論是那一次調查，教育都是決定一個人評估自己國語能力好不好最重要的因素。教育程度的直接影響力比其他變項都來的大。我們可以想像的到，教育程度越高，國語就說的越好。然而，當教育以及其他一些相關的因素都控制住後，閩南族群在國語使用上還是最不流利，而客家人的國語能力和外省人相比的話並無顯著的差

別，顯示出閩南族群的國語資源最少。而且，經 LISREL 的「跨組參數等值」檢定結果得知，二條短迴歸所推估出的閩南人與其他人的對比（92 年是 $\beta = -.09$ ，99 年是 $\beta = -.06$ ），其實並無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df=1$ ， $\chi^2=0.99$ ）。換言之，在九〇年代裡，閩南族群在國語使用方面處於劣勢的情況並無改善的跡象。

除此之外，我們可以在表 4 上看到，國語能力與出身家庭背景也有密切的關聯；父親的社會階層越高，兒子的國語能力就越強。這一點發現吻合 Bourdieu(1991)有關「語言實踐能力因階級而異」之理論預測（詳見前文之討論）。此外，如果在工作上經常需要使用國語的話，國語能力也會比較強。另一方面，族群的空間分佈也會影響個人的語言能力。具體而言，在客家或外省族群密度較高的社區裡長大的人，國語能力較佳；反之，在閩南語社區長大的話，國語能力會比較差，這一個現象在 99 年比較顯著。另一方面，年齡的因素在 92 年比較顯著。兩次調查除了這幾點不同外，整體的型態可說是非常接近。

（三）職業地位分配的遊戲規則：變與不變

地位取得研究主張教育是個人取得職業地位最重要的機制，而教育取得又和個人的家庭背景有極密切的關係，因此不同族群在職業地位上的差異有相當程度可歸因於家庭資源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按照「族群圍籬」(ethnic enclaves)的說法，不同語言技巧的族群在勞動市場上有各自的角落；在主流經濟部門被優勢（語言）族群佔領的情況下，弱勢（語言）族群的私人雇主會傾向於雇用和自己說同樣語言的勞動者（Wilson and Martin 1982）。以台灣來說，「本省人較集中於私人部門、外省人較集中於公共部門」的兩分法，可說是在文獻上最常被提及的省籍職業區隔現象。一般說來，公家機構的職業對於教育資歷的需求比私人機構高，在語言使用上也比較是以國語為主，而外省人在這些條件上都比較優勢。此外，公家機構的白領階級比例也比私人機構高，因而其平均 ISEI 分數也比較高。然而，在九〇年代末期，當台灣男性勞動人口的教育水準普遍提高、本地族群之職業階層向上

提昇的時候，外省族群的平均職業地位分數卻反而有稍微（但不顯著）下降的趨勢。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因為政治氣氛的轉變使得勞動市場上的省籍職業區隔現象已經有所改變，政府部門不再是外省族群密度較高的角落。但是也有其他的可能原因，比方說勞動市場上的競爭越來越自由，在績效(meritocracy)原則的運作下，個人能力的因素重於族群或社經背景的考量；或者剛好相反，在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下，私人雇主的偏好愈來愈強勢，同類相聚的傾向更加的濃烈。此外，上述的初步觀察也有可能純粹只是因為兩次調查樣本的人口特性不同所造成的統計結果而已，不牽涉到勞動市場的運作是否改變的問題。有鑑於此，本節的實徵分析使用族群、出身家庭社經背景、教育取得、勞動市場區隔、工作所使用的語言、各項語言能力、及年齡等多個自變項來解釋職業地位的高低，試圖釐清職業地位取得之決定因素的變遷趨勢。

表 5 報告以 ISEI 分數為依變項，分別就兩次調查樣本所進行之多元迴歸分析的結果。表 5 一共陳列了四條 OLS 迴歸方程式的參數推估值。第一與第三條方程式是長迴歸，包含較多的解釋變項。由於在分析的過程裡，經反覆試驗後，已確定有些變項對於解釋職業地位的高低並沒有實質的作用——譬如說，在語言能力方面只有國語才是有效的語言資本，其餘的語言能力在統計上並無顯著的正效應——因此短迴歸（第二與第四條方程式）只放入那些具有重要作用的自變項。此外，本文也使用 LISREL 的多組樣本分析法，來驗證短迴歸的參數設定是否合理，以及兩組方程式相對應的參數是否等值的問題。對照 OLS 迴歸分析和 LISREL 的「跨組參數等值檢定」結果得知，兩次調查的男性樣本在職業地位取得方面有些相似與相異之處。

表 5 職業地位之決定因素：依調查時間分

自變項	1992 年		1999 年	
	(1)	(2)	(3)	(4)
族群 (相對於外省人)				
閩南人	-1.409 (1.845) [-.041]	-	2.636 (1.218) [.072]*	2.562 (.892) [.070]*
客家人	-2.098 (2.010) [-.050]	-	-	-
家庭社經背景				
父親教育	-.021 (.155) [-.006]	-	.206 (.113) [.057]	-
父親職業	.106 (.041) [.108]*	.111 (.035) [.113]*	.041 (.030) [.042]	.069 (.026) [.071]*
教育取得				
教育年數	1.595 (.192) [.433]*	1.631 (.169) [.443]*	1.856 (.152) [.406]*	1.913 (.150) [.418]*
(教育年數) ²	.106 (.026) [.143]*	.113 (.025) [.152]*	.165 (.027) [.158]*	.168 (.027) [.161]*
勞動市場區隔				
公家機構 (相對於私人機構)	2.999 (1.535) [.069]	2.894 (1.451) [.067]*	3.537 (1.118) [.076]*	3.542 (1.118) [.077]*
工作的語言需求				
使用國語	-.087 (1.601) [-.002]	-	2.529 (.872) [.082]*	2.606 (.869) [.084]*
使用閩南語	-1.620 (1.381) [-.051]	-	-2.945 (.979) [-.081]*	-3.004 (.972) [-.082]*
語言能力				
國語流利程度	.910 (.263) [.168]*	1.045 (.225) [.193]*	.649 (.204) [.097]*	.633 (.189) [.095]*
閩南語流利程度	.303 (.269) [.043]	-	-.100 (.219) [-.012]	-
年齡	-.013 (.051) [-.010]	-	.169 (.041) [.108]*	.156 (.040) [.100]*
常數項	17.436 (4.379)	15.467 (1.655)	8.521 (3.259)	7.826 (2.870)
R ²	.431	.427	.436	.434

* 顯著水準 $\alpha = .05$ 時顯著。各變項之迴歸係數推估值依 b、(S.E)、[B]之順序排列。

首先，就共同點而言，不論是 92 年或 99 年，台灣的職業階層化現象都可以直接歸因於家庭社經背景不平等、教育程度不同、勞動市場區隔、及國語技巧有所差別之故。如表 5 上的第二與第四條迴歸方程式所示，上述這些變項對於職業地位的分配都有自己獨特的影響力，其中以教育取得是決定個人職業地位最重要的因素。我們在表 5 上可以看到教育變項的標準化係數（92 年與 99 年的係數值分別是 $\beta = .44$ 與 $\beta = .42$ ）比其他變項都來的大，而且教育對提昇職業地位的作用不只是直線式的正向關係，還呈現出拋物線式的上升趨勢。換言之，隨著個人教育程度的提高，教育年數對職業地位流動的效果就愈大。當控制住教育程度以及其他的相關因素後，國語流利對於職業地位的淨效果（92 年與 99 年的係數值分別是 $\beta = .19$ 與 $\beta = .10$ ）在統計上相當的顯著。事實上，國語能力的重要性僅次於教育，這一點發現係由逐步迴歸分析的結果得知，在表 5 上無法直接觀察得到。此外，兩次調查都清楚的指出：父親的職業地位與兒子的職業地位有緊密的直接關聯（92 年與 99 年的係數值分別是 $\beta = .11$ 與 $\beta = .07$ ），以及在公家部門服務有助於提昇職業地位等現象（92 年與 99 年的係數值分別是 $\beta = .07$ 與 $\beta = .08$ ）。在此必須說明的是，若比較表 5 所報告的上述這五個變項（父親的職業地位、教育年數、教育年數的平方、公家部門、及國語能力）的迴歸係數的話，92 年和 99 年的推估值看起來好像有些差別，但是經 LISREL 的跨年均等值檢定結果得知，這兩次調查在這五個參數的推估值方面並無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df = 5$, $\chi^2 = 5.94$ ）。基於此，我們可以確定在九〇年代裡，父子代間職業傳承、教育階層化、勞動市場區隔、以及語言技巧等因素，對於男性職業地位取得的直接影響力，其實是相當的穩定。然而，這並不表示職業地位分配的規則一成不變。

事實上，比較表 5 所報告的兩次調查結果也可以觀察到一些時間變遷的軌跡，比方說在 99 年時，男性隨著經驗的增長職業地位向上流動的現象比較清楚，年齡的差別（ $\beta = .10$ ）有越來越明顯的趨勢。不過，更重要的變化係發生在族群以及工作的語言需求對於職業地位取得的

影響上。更詳細的說，在 92 年的分析樣本裡，不同族群的職業地位之所以有不平等的現象，主要是因為他們在家庭社經背景、教育程度、勞動市場部門、及國語能力上有所不同之故（ $R^2 = .43$ ）；當這些差別被控制住後，族群的職業地位差異就消失了，詳見表 5 上的第二條迴歸方程式。這一點發現和蔡淑鈴（1988）的早期研究結論一致。反之，在 99 年的調查裡，即使考慮了上述這些因素對於職業地位取得的顯著作用後，族群差異仍然存在，而且主要的族群差異可說是來自於閩南族群的相對優勢機會，因為客家人和外省人彼此之間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df=1$ ， $\chi^2 = 0.38$ ）。如表 5 的第四條迴歸方程式所示：當其他條件相同時，閩南人的 ISEI 分數會比較高，大約比其他兩個族群的人高出 2.6 分，意味著到了九〇年代的末期，閩南人在職業地位的競爭上比較有利。除了閩南族群的相對優勢機會外，表 5 的分析結果也顯示出：工作的語言需求對於職業地位分配的影響在 92 年並不重要，但是到了 99 年時，其直接影響力卻轉變為相當的顯著。更具體的說，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如果受訪者所從事的職業是以國語為主要語言的話，他的職業地位會比使用其他語言的工作者高出 2.6 分（ $\beta = .08$ ）；反之，如果必須以閩南語來溝通工作的話，職業地位會降低 3.0 分（ $\beta = -.08$ ）。這一點發現和前述之語言能力的效用相對照的話，特別有趣。

總言之，社會階層研究一向強調家庭社經背景、學校教育、以及勞動市場的公私部門區隔是決定職業階層化現象的主要原因。的確，由以上的分析我們也可以體會到這些因素有其持續不變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本文認為語言使用也是一個決定職業地位分配的重要機制。戰後國民黨政府以公權力來強制推行單一的國語政策，五十多年後，國語在台灣已經有非常穩固的市場價值了。就語言的供給面來說，國語愈流利的人職業地位就愈高，這是九〇年代裡的常態現象。就語言的需求面而言，使用國語的職業和使用其他語言的職業在地位上有清楚的差序，這是 99 年的調查結果。有趣的是，當其他條件一樣時，也就是說當其他資源的分配趨近於平等時，閩南人在成就機會方面，反而轉變成勞動市場的新興優勢族群。由於在過去的相關研究裡未曾出

現過相類似的發現，因此本文接著進行下列兩項分析：1.以職業類別為依變項，明辨出閩南族群到底是在那一些職業階層裡有比其他族群更優勢的機會；及 2.繼續以 ISEI 分數為依變項，進行族群分組迴歸分析，釐清各個族群的職業成就之道有無差別。

（四）階級流動的競爭：九〇年代末期的機會重分配

這部份的分析以受訪者在勞動市場上的階級位置為依變項，使用 Multinomial Logit 的多變項迴歸分析方法，來確認在九〇年代末期，閩南族群的成就機會是否較其他族群更優勢。如前所述，本研究將受訪者的職業類別依 EGP 的階級分類標準分為四大階級，依序為：1.白領階級、2.小資產階級、3.技術工人階級、及 4.非技術工人與農民階級。這四個階級不論是平均教育年數或是平均 ISEI 分數，都清楚的呈現出由高到低的層級關係，詳見附表 1。本節的分析以農工階級為對照組，來測量向上階級流動的決定因素。表 6 報告和表 5 之短迴歸相對應的 Multinomial Logit 分析結果。必須說明的是，由於職業的階級分類和勞動市場的公私部門區隔有相當程度的重疊，因此在這部份的分析裡無法（也不需）測量公私部門的差別。

檢視表 6 所陳列的各個解釋變項之參數推估值，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現象以及一些新的發現。首先，不論是 92 年或 99 年的分析結果都顯示出，教育的效用對於白領階級特別的重要；反之，教育對於預測一個人到底是小資產階級 / 技術工人或農工階級，並無顯著的解釋力。此外，針對父子代間職業傳承的傾向來說，技術與非技術工人彼此之間並沒有多大的不同，但是對於其他的階級則有一些顯著的差別。在 92 年的分析樣本裡，如果父親的職業地位在 ISEI 量表上多增加一分的話，兒子進入白領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可能性比兒子是農工階級的可能性，顯著增高大約 1.02 倍（以乘法計算）。同樣的，以父親的職業地位來預測 99 年男性樣本的階級位置也有一些作用。不同的是，在 99 年時，父子代間職業傳承的力量只出現在小資產階級和農工階級之相對機率的對比上。

表 6 階級流動的 Multinomial Logit 分析：以農工階級為對照組

自變項	1992 年調查			1999 年調查		
	白領階級	小資產階級	技術工人階級	白領階級	小資產階級	技術工人階級
閩南族群 (相對於其他人)	-	-	-	.596 (.244) (1.815)*	.919 (.345) (2.507)*	-.212 (.256) (.809)
父親的職業地位	.020 (.010) (1.020)*	.025 (.011) (1.025)*	.016 (.010) (1.016)	.014 (.007) (1.014)	.026 (.009) (1.026)*	.008 (.008) (1.008)
教育年數	.400 (.051) (1.492)*	-.056 (.062) (.946)	-.015 (.052) (.985)	.312 (.040) (1.366)*	.126 (.050) (1.134)	-.005 (.043) (.995)
(教育年數) ²	.028 (.009) (1.028)*	-.009 (.010) (.991)	.000 (.007) (1.000)	.030 (.007) (1.031)*	-.010 (.011) (.990)	-.004 (.008) (.996)
工作的語言需求 使用國語	-	-	-	.575 (.219) (1.777)*	.083 (.277) (1.086)	.214 (.232) (1.238)
使用閩南語	-	-	-	-.169 (.280) (.844)	.082 (.390) (1.085)	.706 (.347) (2.026)*
國語流利程度	.250 (.061) (1.284)*	.173 (.062) (1.188)*	.104 (.052) (1.110)	.161 (.048) (1.175)*	.100 (.060) (1.105)	-.001 (.049) (.999)
年齡	-	-	-	.008 (.011) (1.008)	.040 (.013) (1.040)*	-.038 (.012) (.963)*
常數項	-6.758 (.620)	-2.094 (.657)	-1.371 (.545)	-5.724 (.836)	-5.925 (1.048)	.729 (.902)

* 顯著水準 $\alpha = .05$ 時顯著。各變項之參數推估值依 B、(S.E)、 $\exp(B)$ 之順序排列。

除了出身家庭背景以及教育取得的因素外，語言能力也是決定階級位置的一個重要因素。當控制住階級背景與教育程度後，國語流利的人比國語不流利的人更不可能去當體力工人或務農。如表 6 所示，在 92 年時男性受訪者每增進一分國語技巧，他會因此而晉陞到白領階級的可能性比他會沈淪到農工階級的可能性高出 1.28 倍；此外，他會變成小資產階級的相對機率比是 1.19 倍，成為技術工人的相對機率比是 1.11 倍，這些對比也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反之，在 99 年的分析樣本裡，國語能力的顯著影響只出現在白領階級和農工階級的對比上；在預測小資產階級 / 技術工人和農工階級的差別時，年齡比國語

能力更有作用。另外，在 99 年時，我們可以觀察到不同階級的工作語言需求不一樣：白領階級使用國語的可能性高於其他階級；反之，技術工人使用閩南語的機率則顯著的高於其他階級。

最後，99 年的分析結果也指出：在同等的條件下，閩南族群比其他人有更顯著的機率可以成為白領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如表六所示，在教育程度、家庭背景、語言使用、及語言技巧等條件都相近的情況下，閩南人是小資產階級的機率比其他族群的機率高 2.51 倍，閩南人是白領階級的機率也比其他族群的機率高 1.82 倍。根據 EGP 的階級分類標準，小資產階級包括自營作業者以及小型企業的雇主，而白領階級則由服務階級（企業主或專業性工作、高技術工作、行政工作、及管理工作等職業）以及一些較低階的白領雇員所組成。不論是自己當老闆或是受雇於人，閩南族群在九○年代的末期都比其他族群有更多的機會可以爭取到中產階級的職業。他們到底是依循何種途徑來爭取這些成就的機會呢？緊接著，本文再次以 ISEI 分數為依變項，繼續探究不同族群在職業競爭方面有何獨特的成功秘訣。

（五）比較各族群的成就之道：九○年代的變遷趨勢

本節的分析重點是比較不同的族群在不同的時間點是否經由不同的機制來取得職業地位。表 7 一共陳列了六條迴歸方程式，分別就兩次調查的三個族群樣本推估出家庭社經背景、學校教育、勞動市場區隔、工作的語言需求、國語流利程度、及年齡等自變項對職業地位取得的相對影響力。由於有些變項在特定的時間點對特定的族群並無實質作用，而且經統計檢定結果也確知這些參數可以被精簡之（92 年的相對應數據是 $df=14$ ， $\chi^2=11.52$ ；99 年是 $df=12$ ， $\chi^2=9.07$ ；兩者皆不顯著），因此表 7 上的迴歸方程式只考慮那些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決定因素。比較這六條迴歸分析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閩南、客家、及外省三個族群之個別的地位取得模式及其變遷趨勢。

表 7 各族群之職業地位取得的決定因素：依調查時間分

自變項	1992 年			1999 年		
	閩南 (1)	客家 (2)	外省 (3)	閩南 (4)	客家 (5)	外省 (6)
父親職業地位	.112 (.045) [.104]*	-	.193 (.089) [.212]*	-	-	-
教育取得						
教育年數	1.541 (.200) [.448]*	1.971 (.399) [.437]*	1.260 (.449) [.287]*	2.111 (.151) [.482]*	2.038 (.437) [.379]*	2.561 (.533) [.371]*
(教育年數) ²	.089 (.027) [.140]*	.305 (.103) [.229]*	.246 (.089) [.277]*	.172 (.028) [.168]*	.459 (.105) [.356]*	-
勞動市場區隔						
公家機構 (相對於私人機構)	-	-	-	-	-	12.112 (2.809) [.302]*
工作的語言需求						
使用國語	-	-	-	3.436 (.963) [.114]*	-	-
使用閩南語	-	-	-	-2.386 (1.185) [-.060]*	-4.915 (2.223) [-.154]*	-
國語流利程度	1.190 (.264) [.233]*	1.703 (.627) [.236]*	-	.708 (.205) [.109]*	-	1.320 (.656) [.151]*
年齡	-	-	-	.227 (.044) [.152]*	-	-
常數項	16.381 (1.966)	8.047 (4.763)	23.138 (6.661)	6.845 (2.964)	19.317 (5.225)	5.488 (7.075)
R ²	.404	.433	.306	.428	.515	.366

* 顯著水準 $\alpha = .05$ 時顯著。各變項之迴歸係數推估值依 b、(S.E)、[β]之順序排列。

首先，就九〇年代台灣社會流動的整體型態來說，毋庸置疑，學校教育是決定職業地位分配最重要的機制，不論是在那一個時間點或屬於那一類族群，基本上每個人都可以憑藉著自己的教育成就來競爭勞動市場位置。經由教育可以積累人力資本與文化資本，這種教育效用對於較少依賴家庭資源來競爭職業地位的客家人來說，尤其重要。詳而言之，在 92 年的時候，父親職業地位對兒子職業地位的影響以外省人最高（標準化迴歸係數值是 $\beta = .21$ ），閩南人其次（ $\beta = .10$ ），但

是對客家人則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因為客家人在職業階層裡力爭上流靠的就是他們自己的能力：教育資歷以及國語能力（詳見表 7 第二條迴歸方程式）。到了 99 年時，客家人主要還是依靠寒窗苦讀的功夫來換取好職位，至於國語是否流利已經不重要了，反而是閩南語的工作環境會讓他們很吃虧。如表 7 第五條迴歸方程式所示，客家人如果從事需要經常使用閩南語的工作，那麼他的職業地位會比同樣教育程度的其他客家人低 4.9 分（ $\beta = -.15$ ）。這個發現意味著閩南語的工作領域是一個「壞」的勞動市場，不是客家人可以安身立命的角落。閩南語市場區隔加上學校教育的效應，兩者合起來可以解釋一半以上客家人職業地位分配的變異量（ $R^2 = .52$ ）。

其實，不只是客家人在閩南語的工作領域裡嚐到語言市場區隔的苦澀滋味，閩南人在那裡也同樣的不利。如表 7 第四條迴歸方程式所示，在 99 年的分析樣本裡，當其他條件一樣時，閩南人如果在工作上需要經常使用閩南語的話，他的職業地位會比其他閩南人低 2.3 分（ $\beta = -.06$ ）；反之，如果閩南人進入一個以國語為主的工作環境的話，他的職業地位會提高 3.4 分（ $\beta = .11$ ）。兩相對照下，使用國語的工作領域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好」的勞動市場，但是前提是要有良好的國語技巧，因為流利的國語是閩南人向上社會流動必備的另一項基本要件，而且國語的正效應一直很穩定（比較兩次調查的相對應參數是否等值的檢定結果是 $df=1$ ， $\chi^2=2.1$ ，在統計上並不顯著，亦即兩者無差異）。反之，教育帶給閩南人的職業地位回報則有隨著時間顯著增強的趨勢（ $df=2$ ， $\chi^2=8.51$ ），不過在 99 年時閩南人的教育效用如果和客家人相比較的話，還是顯著的低了一些（ $df=2$ ， $\chi^2=8.76$ ）。此外，父子職業傳承的傾向已經轉變為不重要了，取而代之的是寶貴的人生經驗：在 99 年的閩南樣本裡，年齡差別非常顯著（ $\beta = .15$ ），男性職業地位隨著年資逐漸向上流動的現象很清楚，這一點和其他族群不同。總言之，如果將上述之各項決定因素依重要性來排列的話，依序是學校教育、國語的勞動市場、年齡、國語能力、及閩南語的勞動市場，這些變項加起來可以解釋四成以上閩南人職業地位分配的變異量（ $R^2=.43$ ）。

另一方面，比較表 7 第三條與六條迴歸方程式，我們可以看到在 92 年時，外省人的職業成就主要是由自己的教育和父親的職業地位來決定 ($R^2=.31$)；控制住這兩種因素後，在那一個勞動市場工作並沒有多大的地位差別。到了 99 年時，外省人代間職業傳承的傾向已經不再顯著了，取而代之的是勞動市場公私部門區隔以及國語能力的效用 ($R^2=.37$)。詳而言之，雖然外省人也同樣是經由學校教育的管道來追求功成名就 ($\beta=.37$)，然而在教育程度相同的情況下，服務於公家單位的外省人比在私人機構工作的外省人的職業地位高 12.1 分 ($\beta=.30$)，其中的意涵是政府部門仍然是外省人較舒適的角落。如前所述，外省人已經不再像從前那樣的高度集中在政府部門，但是在這樣的轉變中，在公家機構服務反而更重要，在那裡面可以獲得較有利的工作機會，是他們較佳的職業選擇。換言之，不論是自願或非自願的退出政府部門，外省人在私人部門的處境並不如意，只能找到比公部門較差的職位。另一方面，雖然國語可說是外省第二代的母語，但是國語能力對外省人的重要性卻越來越強 ($\beta=.15$)，這一點發現出乎意料之外，和研究假設三的預測不符合。總而言之，本研究發現在九○年代的末期，高教育程度、使用標準國語、投入公部門勞動市場的外省人比其他外省人有更多出人頭地的機會，而這些社會流動的途徑和國家所掌控的一些機制——學校教育、政府部門、及國語政策——貼的緊緊的，所以看起來外省人比其他人更需要依賴國家機器的庇蔭。

六、 結論與討論

語言是一種非常有趣但也十分複雜的心智活動，因此語言哲學家 Fodor(1976: 201)說語言獲得是「一個假想無意識規範的無意識理性過程」，聽起來很抽象也很有學問的樣子，然而對於社會階層的研究者而言，語言的獲得和使用還是應該有規則可尋才是，因此思考如何使用實徵研究的方法來驗證語言差異和社會不平等的關係，應該是一件值得嘗試的挑戰性工作。在此體會下，本文試圖將語言使用和語言技

巧帶入傳統的地位取得研究裡來。文中強調：就微觀層次而言，語言能力是人力資源開發、向上社會流動之鑰。然而，在多語系的社會裡，語言資本的運作和語言階序、語言規範有極密切的關係，並非所有的語言能力都可以兌換到同等值的語言資本。一般而言，優勢族群的語言通常就是大社會的主流語言，具有最高的正當性，代表著「普同化」的資本價值；反之，弱勢族群的語言常常被區隔開來，只能在特定的族群圍籬內流通。其結果是：在宏觀層次上，不同的族群團體常常為了要維護（或爭取）本族語言的正當性，必須彼此競爭有限的語言資源。通常，支配團體可以掌控到較多的社會資源，擁有較大的權力來主導社會何去何從，是要走單一文化（語言）統合的路線呢？還是應該往多元文化（語言）發展呢？經由政治的過程，支配團體的抉擇形塑出制度化的族群分化（或對立）模式。以台灣來說，過去百年來曾經兩次轉換國語。在語言宰制的情況下，執政者透過高壓政治手段來強制實行單元文化國語政策的結果，不同語言使用者的社會位置被區隔開來。「標準國語」的語言資源會讓「國語標準者」有機會藉著語言的差別，凸顯出他們的優越與秀異，並追求其利益。由這樣的角度來看，國語在台灣當然不會只是人際溝通的媒介而已，還是統治者用來掌控政治、操弄社會的武器，另一方面也是被統治者通往社經成就之路。

本文使用九〇年代的全台社會調查資料，來探討語言使用與社會階層化的關係及其變遷趨勢，文中所提出的研究假設雖然大部分都可以得到實徵證據的支持，但也有一些意外的發現。更具體的說，比較兩次調查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在九〇年代裡，外省人的平均教育與職業地位維持在一定的水準，而閩南族群與客家族群則有向上提昇的趨勢，因而拉近了省籍職業階層化的距離。在這樣的轉變中，父子代間職業傳承、教育階層化、勞動市場區隔、以及語言技巧等因素，對於男性職業地位取得的直接影響力其實是相當的穩定，比較特殊的是族群差異的變化。當其他條件一樣時，閩南族群不論是繼承家業、自行創業、或是受雇於人，都比其他族群有更多的機會可以爭取到中產

階級的職業，成為勞動市場的新興優勢族群。然而，必須強調的是，上述之發現必須在資源分配趨近於平等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發生，而目前的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比方說，就語言資源的分配而論，閩南人在國語使用上的相對劣勢仍然顯著，但同樣是本地族群的客家人，則國語技巧和外省族群差不多。客家人在職業階層化的過程裡，較少依賴家庭資源，主要是依靠他們自己的能力來力爭上流。客家族群在台灣扮演著「少數中間人」的角色——他們的社經背景與成就地位和閩南族群相接近，但在資源的分配上又有被邊緣化的困境——「少數中間人」的結構位置，使得客家人比多數族群的閩南人，更需要努力去適應宰制語言的功能要求。另一方面，雖然外省人傾向於集中在公部門勞動市場的傳統似乎已有鬆動的趨勢，但是依循著國家可以掌控的機制來達到向上社會流動的目的，對外省人來說還是有利。

除此之外，本文發現在台灣的勞動市場上，國語已經有非常穩固的市場價值了。就個人的語言供給來說，國語愈流利的人職業地位就愈高。就工作的語言需求而言，使用不同語言的工作在職業地位上有清楚的階序：閩南語的工作領域是一個「壞」的勞動市場，使用國語的工作領域則是一個「好」的勞動市場。這一點發現吻合本文的基本立論。然而，由於文中有些關鍵性的變項——特別是那些與結構性的勞動市場因素或個人的勞動市場經驗有關的變項——欠缺直接的測量，因此我不認為在此研究裡已找到所有問題的完整答案，未來還需要就此主題繼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譬如說，本研究以受訪者自己所評估的語言流利程度為指標，來測量各項語言的獲得以及能力的高低。事實上，這個變項很可能已經隱藏著社會心理因素的陰影了：自信心較強的個人（與族群）會有高估自己實際的語言能力之傾向；反之，較謙卑的個人（與族群）則有可能會低估自己的能力。值此之故，我認為使用主觀評估的方法來測量個人（與團體）之語言能力，或許可以（部分的）反射出語言作為外顯的地位特徵對於不同的語言使用者可能會有集體心理作用，但也有可能會因而干擾到語言作為一種特殊的認知能力在資源競爭方面原有的效用，因此未來的研究若有機會可以使

用一些更客觀、更準確的認知測驗來測量語言能力的話，應該可以提升實徵研究的品質。

最後，讓我更在意的是語言獲得和教育取得之間應該存在著辯證的關係，同樣的，語言能力和職業地位取得之間的關係也並非「不可回溯」，然而台灣目前尚缺乏直接相關的長期動態資料，因此本研究只能盡量控制住教育程度以及練習的因素對語言能力的影響，以測量出語言對職業地位的「淨」效果，無法探究在不同階段的生命歷程裡，語言如何影響到不同個人（與團體）之社會地位取得的過程和結果。有關語言獲得、教育取得、及勞動市場成就的「可回溯」因果模型分析，有待未來研究之分解。總而言之，地位取得研究一向強調生命發展的概念，不論是語言的獲得或者是社會地位的取得，都是從家庭開始，而家庭可以是社會不平等的根源，也可以是社會均等的未來希望。因此，我們應該更努力去收集一些更貼切的經驗資料，以捕捉由出身家庭到成就地位這一段生命歷程裡的社會階層化現象，並實徵探討一些重要的國家政策如何形塑出個人（與家庭）的生命安排以及結構性的社會不平等。這應該是一個值得繼續努力發展的研究方向。

誌謝：本研究的實徵分析最初只有使用 1992 年的調查資料，並先後完成三個版本的中英文初稿，分別發表於 ISA-RC28 在波蘭華沙所舉行的「社會階層研究委員會春季會議」（1999 年 5 月）、香港中文大學所舉辦的「第二屆華人社會社會階層研究研討會」（1999 年 10 月）、以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的「第二次台灣—以色列社會學研討會」（2000 年 1 月）。特拉維夫大學的 Yossi Shavit 教授與 Moshe Shokeid 教授分別在「華沙會議」與「台以研討會」上擔任英文初稿的評論人，柯志明教授則費心細讀發表於「香港會議」的中文初稿，他們三位都提供了許多寶貴的專業建議。而這個時候，也剛好 1999 年調查研究計畫小組決議要舉辦「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二）：差異、認同與階層化研討會」（2001 年 1 月），因此我就以九〇年代的變遷趨勢為實徵分析的主軸，完成了這篇論文（第四個版本），特此感謝研究群同仁（特別是召集人王甫昌教授，以及蕭新煌教授與吳乃德教授）的同儕壓力與鼓勵，以及吳齊殷教授在個人電腦統計軟體方面的協助。最後，謝雨生教授在「族群會議」上所提供的評論意見、陳志柔教授的讀後感、陳寬政教授的書面意見、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評審意見，亦一併致謝。

附表一 各階級的平均教育年數與 ISEI 分數：依調查時間分

階級分類	1992 年		1999 年	
	教育年數	ISEI 分數	教育年數	ISEI 分數
白領階級	13.50 (2.76)	59.97 (10.31)	13.47 (2.68)	59.47 (10.41)
小資產階級	8.57 (3.33)	50.34 (5.81)	10.69 (2.99)	46.34 (7.63)
技術工人階級	8.16 (3.68)	35.14 (5.30)	10.22 (2.90)	34.98 (5.12)
農工階級	7.49 (3.76)	29.38 (6.09)	9.44 (3.23)	30.71 (5.83)

註：括號內的數據是標準差。

參考文獻

- 王甫昌 (1994) 族群同化與動員：台灣民眾政黨支持之分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77：1-35。
- (1998) 族群意識、民族主義與政黨支持：一九九〇年代台灣的族群政治。台灣社會學研究 2：1-45。
- (2000) 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計劃執行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吳乃德 (1997) 檳榔和拖鞋，西裝及皮鞋：台灣階級流動的族群差異及原因。台灣社會學研究 1：137-167。
- (1999) 家庭社會化和意識型態：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世代差異。台灣社會學研究 3：53-85。
- 林忠正、林鶴玲 (1993) 臺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見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頁 101-155。台北：業強。
- 施添福 (1987) 清代在台漢人的祖籍分佈和原鄉生活方式。台北：師範大學地理系。
- 徐正光、蕭新煌 (1995) 客家族群的語言問題：台北地區的調查分析。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 10：1-40。
- 章英華 (1986) 台灣都市區位結構的比較研究：以台北、台中、高雄為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 18：25-50。
- 陳其南 (1984) 土著化與內地化：論清代台灣漢人社會的發展模式。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頁 335-366。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 陳紹馨 (1979) 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
- 張茂桂 (1993) 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見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頁

- 233-278。台北：業強。
- 黃宣範 (1993)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北：文鶴。
- 蔡淑鈴 (1988) 社會地位取得：山地、閩客及外省之比較。見楊國樞與瞿海源編：變遷中的台灣社會，頁 1-44。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1990) 兩性之經濟成就差異：一個美國的實證研究。美國研究 2：25-49。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文化研究所。
- 蕭阿勤 (1999) 1980 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台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台灣社會學研究 3：1-51。
- 蕭新煌 (1997) 從省籍矛盾到族群差異、從國家認同到統獨爭議：歷史與社會的思辯。族群正義與人權保障論文集，頁 65-79。台北：二二八紀念基金會。
- (1999) 社會文化轉型：背景、內涵與影響。見施建生編：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台灣經濟發展經驗，頁 207-266。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
- 瞿海源 (1992)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第二期第三次調查計劃執行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Ben-Rafael, Eliezer (1994) *Language, Identity, and Social Division: The Case of Israe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rrol, Selma Cantor (1995) *Growing Up American: Immigrant Children in America Then and Now*.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 Bonacich, Edna (1972) A Theory of Ethnic Antagonism: The Split Labor Marke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 547-59.
- Calhoun, Craig (1993)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211-239.
- Cheng, Robert L. (1994) Language Unification in Taiwan: Present and Future. Pp. 357-91 in *The Other Taiwan: 1945 to the Present*, edited by Murray A. Rubinstein. New York: M. E. Sharpe.
- Chomsky, Noam (1975)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Duncan, Otis Dudley (1969) Inheritance of Poverty or Inheritance of Race? Pp. 85-110 in *On Understanding Poverty*, edited by Daniel P. Moynihan. New York: Basic Books.
- Erikson, Robert and John H. Goldthorpe (1992)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Evans, M. D. R. (1987) Language Skill, Language Usage and Opportunity. *Sociology*

21: 253-74.

Evans, M. D. R. and Jonathan Kelley (1991) Prejudic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Labor Market: Attainments of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 721-59.

Fishman, Joshua A. (1972) *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Two Integrative Essays*.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Fodor, Jerry A. (1976) *The Language of Thought*. Hassocks: Harvester Press.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Gates, Hill (1981) Ethnicity and Social Class. Pp. 241-81 in *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 edited by Emily Martin Ahern and Hill Ga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iles, Howard (1977) *Language, Ethnic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Ganzeboom, Harry B. G., Paul M. De Graaf, and Donald J. Treiman (1992) 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1:1-56.

Gordon, Milton M.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illo, R. D. (1989) *Dominant Languages: Language and Hierarchy in Britain and in Fr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usky, David B. (1994)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Hannan, Michael T. (1979) The Dynamics of Ethnic Boundaries in Modern States. Pp. 253-75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System*, edited by John W. Meyer and Michael T. Hann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user, Robert M. and David Featherman (1977) *The Process of Stratification: Trends and Analys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Hechter, Michael (197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thnic 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 1151-78.

Hirschman, Charles (1983) America's Melting Pot Reconsidered.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397-423.

Hsiao, Hsin-Huang Michael (1998) Normative Conflict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Pp. 320-51 in *The Limits of Social Cohension: Conflict and Mediation in Pluralist Societies*, edited by Peter L. Berg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Hsiau, A-Chin (1997) Language Ideology in Taiwan: The KMT's Language Policy, the Tai-yu Language Movement, and Ethnic Politic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18: 302-15.
- Huang, Shu-Min, Chung-Min Chen, and Ying-Chang Chuang (1994) Introduction: Problems of Ethnicity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Pp. 4-22 in *Ethnicity in Taiwan: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Chung-Min Chen, Ying-Chang Chuang and Shu-Min Huang.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Keith, Verna M. and Cedric Herring (1991) Skin Tone and Stratification in the Black Commun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 760-78.
- Kulick, Don (1992) *Language Shift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Socialization, Self, and Syncretism in a Papua New Guinean Vill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rashen, Stephen D. (1988)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London: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UK) Ltd.
- (1995)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ondon: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UK) Ltd.
- Lai, Jeh-Hang, Ramon Hawley Myers, and Wou Wei (1991) *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nski, Gerhard E. (1966) *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Lewin-Epstein, Noah and Moshe Semyonov (1994) Sheltered Labor Markets, Public Sector Employments, and Socioeconomic Returns to Education of Arabs in Israe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22-51.
- Mead, George Herbert (1974) The Problem of Society: How We Become Selves. Pp. 101-10 in *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ety*, edited by Ben G. Blount. Cambridge: Winthrop.
- Mouw, Ted and Yu Xie (1999) Bilingualism and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First- and Second-Generation Asian Americans: Accommodation With or Without Assimil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232-252.
- Mulford, Matthew, John Orbell, Catherine Shatto, and Jean Stockard (1998)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Opportunity, and Success in Everyday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1565-92.
- Neidert, Lisa. J and Reynolds Farley (1985) Assimi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 Analysis of Ethnic and Generation Differences in Status and Achie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 840-50.
- Portes, Alejandro and Dag MacLeod (1996) Educational Progress of Children of Immigrants: The Roles of Class, Ethnicity, and School Context.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9(4): 255-75.
- Rumbaut, Ruben G. and Wayne A. Cornelius (1995) *California's Immigrant Children: Theory,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Policy*. San Diego: Center for U. S.-Mex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Sapir, Edward (1974) Language. Pp. 46-66 in *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ety*, edited by Ben G. Blount. Cambridge: Winthrop.
- Stein, Coleman B. (1986) *Sink or Swim: The Politic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New York: Praeger.
- Shavit, Yossi (1990) Segregation, Tracking, and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Minorities: Arabs and Oriental Jews in Israe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115-26.
- Shavit, Yossi and Walter Muller (1998) *From School to Work: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and Occupational Destin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Tienda, Marta (1982) Sex, Ethnicity, and Chicano Status Attainmen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6(2): 435-72.
- Tienda, Marta, and Lisa J. Neidert (1984)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 Socio-economic Achievement of Hispanic Origin Me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65: 519-36.
- Tsai, Shu-Ling (1992) Social Change and Status Attainment in Taiwan: Comparisons of Ethnic Group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Education and Society* 2: 225-56.
- (1998) The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 in Taiwan. Pp. 443-470 in *From School to Work: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and Occupational Destinations*, edited by Yossi Shavit and Walter Muell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Tsai, Shu-Ling and Hei-Yuan Chiu (1993) Changes in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Taiwan. Pp. 193-227 in *Persistent Inequality: Changing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Thirteen Countries*, edited by Yossi Shavit and Hans-Peter Blossfeld.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Tsai, Shu-Ling, Hill Gates, and Hei-Yuan Chiu (1994) Schooling Taiwan's Wome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7(4):

243-63.

Tsurumi, E. Patricia (1977)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uan, Mia (1995) Korean and Russian Students in a Los Angeles High School:

Exploring the Alternative Strategies of Two High-Achieving Groups. Pp. 107-30 in *California's Immigrant Children: Theory,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Policy*, edited by Ruben G. Rumbaut and Wayne A. Cornelius. San Diego: Center for U. S.-Mex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Wang, Fu-Chang (1989) *The Unexpected Resurgence: Ethnic Assimil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Taiwan, 1945-1988*.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Wang, Horng-luen (2000) Rethinking the Global and the National: Reflections on National Imaginations in Taiwa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7(4): 93-117.

Webster, Murray and James Driskell (1983) Beauty as Statu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9:140-165.

Wilson, Kenneth L. and W. Allen Martin (1982) Ethnic Enclaves: A Comparison of the Cuban and Black Economies in Miam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135-60.